

第二次回国是2010年。这一次我通过朋友介绍，并在曹杨一村居委和居民帮助下，以租房的方式住进曹杨一村，以便直接开展田野调研。在此之前，大概很少有学者以这种方式来研究工人新村。当时比较常见的还是基于文本（文学作品或影视作品），或者是在城市规划、建筑学视角下对住宅户型和街区平面做技术性分析。而我采用的是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，利用租住在新村的6个月时间，深度访谈了曹杨一村60多户工人家庭。

第三次回国是2011年。主要是针对曹杨新村的保护和更新问题，对普陀规划局及其相关专家学者进行了补充调研。

在当下，工人新村的内涵与价值

《新民周刊》：您在著作中提到，如果对工人新村的理解从“住宅类型”或“文化现象”扩展到“根植于中国近现代社会史，与意识形态、经济政策、政治运动和技术发展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居住制度”，新村研究则呈现出一种丰富的可能性。

为什么您认为对上海工人新村的研究，可以从上海当代史、工人群体、城市空间与住房政策，以及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的旧城改造与社区治理这四个领域展开？

杨辰：工人新村的学术价值非常丰富。我认为“至少”可以从这四个领域展开对工人新村的研究。

从历史维度看，在我调研过程中，有许多曹杨一村老人向我讲述了他们一家三代人的新村故事。从最早父母作为劳模，带全家住进工人新村；到20世纪60年代和兄弟姐妹成长于此，经历了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”和70年代的知青返城；再到90年代的工人下岗潮和再就业。这些经历不仅在曹杨一村，在上海其他的工人新村中也很普遍。从曹杨新村工人家庭的生活史，就能看到整个上海工人群体的命运写照。

从社会维度看，人从来不是孤立的。我们关注新村

工人，就要把他们放在当时的经济、社会和政治环境中理解。比如要理解20世纪50年代上海兴建工人新村的缘由，以及在此后的数十年间，工人新村建设时而速度快、标准高，时而速度放缓、标准下降。这些起伏变化都与当时的国家经济政策、社会运动和政治考量有关。可以说，工人新村是上海当代史的缩影。

从空间维度看，工人新村的设计方法和建设过程，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探索期中国工业城市在住房政策、规划设计方法以及资金筹措和住房分配方面政企合作的成功经验，这一点对于今天全国的保障房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。

最后，从90年代末以来曹杨新村面临的旧城改造、遗产保护和社区治理等问题来看，工人新村的研究价值还在进一步凸显。一方面，上世纪50年代兴建的第一批工人新村至今已使用70年，住房拥挤和厨卫合用的情况依然存在，民生改善的要求强烈。另一方面，工人新村也是上海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一代新村工人的集体记忆，是宝贵的文化遗产。如何平衡保护与发展的矛盾，特别是在工人新村被大规模改造或拆除之前，对新村历史、活态遗产保护利用的研究极有必要，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包括您在内，近20年来诸多学者从各种视角对工人新村展开了研究。为什么至今工人新村仍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？

2017年1月，杨辰在上海鞍山三村调研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